

韩国学丛书

韓國學論文集

2004

第十三辑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韩国学丛书

韩国学论文集

2004

第十三辑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5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支持刊行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韩国学论文集. 2004. 第十三辑 /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5. 4

(韩国学丛书)

ISBN 7-80722-037-6

I. 韩... II. 北... III. 韩国—研究—文集
IV. K312.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字 (2005) 第 026661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沈阳市 606 所印刷厂

幅 面 尺 寸: 185mm×260mm

印 张: 14 $\frac{3}{4}$

字 数: 350 千字

印 数: 1—1000

出 版 时 间: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刷 时 间: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 任 编 辑: 金顺玉

封 面 设 计: 杜 江

责 任 校 对: 崔维诚

定 价: 35.00 元

联 系 电 话: 024—23284348

邮 购 热 线: 024—23284335

E-mail: lnzmz@mail.lnpgc.com.cn

韩国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杨通方

副主编：葛振家 徐永燮 宋成有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保云 巫宁耕 宋成有

沈定昌 严 绍 杨通方

徐永燮 徐 凯 韩振乾

葛振家 魏常海

目 录

古朝鲜的中心方位与疆域	曹中屏 (1)
东域学手记(一)——以《壬辰录》、《看羊录》、《愆愆录》 为例看 1592—1598 年朝鲜半岛战争史研究	靳大成 (18)
登莱事变及其对明、后金与朝鲜的影响	孙卫国 (28)
中国明朝诏使与朝鲜李朝远接使唱和诗研究	詹杭伦 (41)
朝鲜朝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以国家、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为中心	金惠承 (57)
17—18 世纪中朝围绕朝鲜人越境问题的交涉	李花子 (76)
华西学派的正统认识与本国认识辨析 ——以《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为中心	王元周 (88)
《美朝修好通商条约》与《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 订立及其异同比较	田豫东 (100)
朴定阳使美前后的中韩关系	朴帝炫 (113)
袁世凯《上朝鲜国王书》等史料考订三则	权赫秀 (136)
抗战期间中国处理韩国问题的经纬及教训	徐万民 (140)
试论岸信介内阁时期的第四次日韩会谈	安成日 (157)
中韩诗论比较举隅	王佑夫 (177)
漢字系 歸化語에 대하여	王 丹 (182)
韩国课外补习政策研究	杨金成 (199)
当代韩国的中国历史研究 50 年	郑成宏 (205)
朝鲜半岛核问题与六方会谈	晋林波 (217)
韩国出兵伊拉克动机何在	沈定昌 (225)

古朝鲜的中心方位与疆域

曹中屏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目前，平壤和汉城的史学界一般把朝鲜半岛“汉郡县时代”（公元前108—313年）以前的文明史称作“古朝鲜”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权威性国史辞书《新增国史事典》对此定义说：“古朝鲜乃是至公元前108年汉四郡设置为止的朝鲜半岛西北海岸地区的部族国家，即所谓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的总称”¹⁾。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是平壤，后来是汉城，史学界有不少人持所谓“辽东中心说”，主张古朝鲜的中心位置在中国的辽东半岛，企图在中国的现有领土内圈画出古代朝鲜的中心方位和疆域²⁾，从而引起了关于古朝鲜中心方位与疆域的争论。本文试图从正面参与古朝鲜的地理位置讨论，兼以回应“辽东中心说”的挑战。

（一）

《三国遗事》称“古朝鲜”为“王俭朝鲜”，它既包括“开国号朝鲜”的“坛（檀）君朝鲜”，也包括被西周册封的箕子朝鲜，即《帝王韵纪》所谓的“后朝鲜”。但是，正如前言已经指出的，现代史学界所谓的“古朝鲜”，还包括《三国遗事》列为另一章的“卫满朝鲜”。不过，它绝不包括什么“发朝鲜”、“真朝鲜”、“马韩朝鲜”之类的“秽貊三朝鲜”³⁾。

“秽貊三朝鲜”说肇端于韩国近代学者郑寅普，他认为所谓古朝鲜应从“发朝鲜”、“真番朝鲜”、“秽貊朝鲜”、“乐浪朝鲜”去把握⁴⁾。最近，韩国《古朝鲜的种族构成——番朝鲜的实体》（以下简称“构成”）一文，以《史记》五帝本纪有“北山戎发息慎”，《管子》揆度篇有“发朝鲜之文皮”，认为“肃慎、息慎、稷慎和朝鲜是同一名称的阿尔泰语的汉语化，只是因为时代不同而表述略有差异”；在这里，“发”是冠词，它与朝鲜连用，“发朝鲜”就是朝鲜，是古朝鲜的一部分；后来又出现“真番朝鲜”之连称。实际上，“发”是与“息慎”和“朝鲜”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中国古代民族，对此作者在即将发表的题为《东夷、秽貊与古代朝鲜》的文章中指出：“有学者经过深入的系统研究，认为发或北发是与貊不同另一个族群，春秋时期他们曾与中原有‘文皮’经贸文化交流，两汉之后发或北发族不见史载，其大部当与挹娄族融合，一部追逐大野兽迁徙北亚地区，《庄子》、《列子》中的‘穷发’、‘终发’⁵⁾当是北发族的文化遗留。如果位于长白山天池以南的穷发与终发是发与北发的后裔，那么，春秋时期与发同时以‘文

皮’和山东半岛进行交易的朝鲜，当在今日的朝鲜半岛境内，可能就是夏禹‘抚’慰的‘北发’与‘发’的近邻——长夷，即良夷，‘乐浪之夷’，即《汉书·地理志》的‘乐浪朝鲜’”⁶⁾。“构成”又把《汉书·地理志》玄菟郡条应劭注：“故真番，朝鲜胡国”判读为“真番朝鲜”连用，并说：《汉书·地理志》辽东郡条“番汗县”下注“汗音寒”，“汗”与“韩”皆是阿尔泰语君长的称呼；《魏略》说燕将秦开取朝鲜西部土地，至满番汗为界，这是在“番汗”上加“满”，即魏满的番汗。因此，断定番韩、发朝鲜、番朝鲜是其地方势力集团的称呼，“发朝鲜”就是“番朝鲜”，待西汉设真番郡，于是就有“真番朝鲜”，即“真朝鲜”。这完全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实际上，古代史籍交代得非常清楚，从全文看，《史记·朝鲜列传》上出现的“真番、朝鲜”，是并列关系，这种并列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则表现为“朝鲜、真番”。至于所谓“马韩朝鲜”更不能成立，充其量它只不过是马韩的代名词⁷⁾，不应该任意曲解史料，把上古的朝鲜与三韩的历史混为一谈。

《三国遗事》所引《古记》说：“坛君王俭”，“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一作方）忽山，又今弥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周虎（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坛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⁸⁾。由于该书作者高丽僧人一然（1206—1289年）在“都平壤城”加注“今西京”，以平壤为国都的“古朝鲜”的中心方位就十分清楚。高丽时期的西京就是现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平壤。《三国史记》在记述高句丽旧都“丸都城经乱，不可复都，筑平壤城，移民及庙社”时说，“平壤者，本仙人王俭之宅也，或云王之都王俭”⁹⁾。该书作者金富轼（1075—1151年）虽只称王俭为“仙人”，而且完全没有出现“坛（檀）君”的称谓，但是明确肯定平壤是“王之都”，间接地承认了檀君王俭都平壤城。因此，应该确认檀君朝鲜和箕子朝鲜的国都同在“平壤城”。

檀君移都阿斯达和藏唐京是箕子受封于朝鲜以后的事。《古记》、《帝王韵纪》均认为白岳山阿斯达即今九月山，其他朝鲜古代文献也大体持此说。《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文化县山川条“九月山”下有注，称：“在县西十里，即阿斯达山……世传檀君初都平壤，后移白岳，即此山也”。藏唐京似也在九月山附近，同书文化县古迹条在“庄坪”下注曰：“在县东十五里。世传檀君所都，基址尚存。《高丽史·地理志》“儒州”条“庄坪”下说“即唐庄京之讹”。“藏唐京”、“唐藏京”、“庄坪”发音近似，应属一地，即今黄海道殷栗郡九月山。可以认为檀君朝鲜初“都平壤城”，箕子朝鲜兴起后，檀君势力先后转移到九月山阿斯达和藏唐京。这里离位于大同江下游的平壤的距离不远，比较合乎情理。所以，连倡导古朝鲜中心在辽东的朝鲜近代学者崔南善也认为这个平壤城就在大同江。

如果说檀君朝鲜的末期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存在于今大同江流域下游的、领域不大的部族或城邦国家。正如某些当代韩国史学家所指出的，“把我们历史的出发点说成是古朝鲜，确切地说是檀君朝鲜，其始祖是檀君。这样的一种古朝鲜观，只不过是一种虚构。因为，它不是以根据韩民族全体，而是根据定居在平壤一带的古朝鲜系统的部分居民的口传记录整理的《古记》、《本记》为基础形成的。《三国遗事》、《帝王韵纪》引用了这些记载。实际上，到高丽后期为止，小中华主义知识分子不

是把檀君朝鲜,而是以箕子朝鲜作为我们历史的出发点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¹⁰⁾。

箕子朝鲜的中心方位争论比较大。严格地说,朝鲜半岛的文明史是从箕子朝鲜开始的。有关箕子朝鲜的记载,就目前所见,最早者当属先秦时代的《逸周书》¹¹⁾。此后,《尚书大传》、《史记》、《汉书》都有记载。《尚书大传·洪范》说:“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洪范”。伏生的这段记述虽比较完整,但因此书早已失传,现行本乃清人陈寿祺辑自《太平御览》“四夷部”1和“封建部”4,又从《通鉴前编》引了“武王胜殷”至“因以朝鲜封之”的文字,难免会有差错。汉书《东夷传》云:“箕子违殷之衰运,避地朝鲜”,与周武王的封与不封没有关系。《易经·明夷卦》的“箕子之明夷”¹²⁾讲的就是箕子朝鲜。但是,以往的两千多年来,这条爻辞中的“明夷”一直被错误地拆开解释,只是到了现代,“箕子之明夷”才认定“明夷”是国名。李镜池先生认为这里的“明夷”是“东方之国,日出处”¹³⁾;《辽阳市志》编者以此作按,认为“明夷即良夷,亦即襄平之由来”¹⁴⁾。王立先生认为甲骨文“朝”字构成与现代字形相似,两个“十”合成草字头,“明”为“朝”的简写;甲骨文、金文表示“光明”的“明”,写成上日下月,而日、月并排的“明”,是“朝”,明夷即朝鲜;以为“朝鲜本来在中国,后来迁往朝鲜半岛”¹⁵⁾。王玉哲先生对该条爻辞做了全面、令人信服的解释,认为“甲骨卜辞中凡有从日从月之‘明’,都是朝夕的‘朝’字”¹⁶⁾;这句爻辞说的“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故事”¹⁷⁾。但是,王先生以“在燕围近郊范围内去寻觅”的思路,得出箕子原封地朝鲜“在燕山易水流域”¹⁸⁾的说法,难以令人苟同。

既然“明夷”就是朝鲜,那么朝鲜的地域,当在檀君朝鲜所在地,即今大同江下游的平壤地区。古今学者之所以倾向于在燕围近处寻找箕子原封地,基本原因之一是不相信殷周时期的人们有能力达到或控制朝鲜半岛中西部沿海地区。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殷周时期,中国已经掌握和具备了远洋的技术和能力。据王国维《今本竹书记年疏证》,夏帝芒十三年,王命“东狩于海,获大鱼”。看来,夏王朝第九代王帝芒时,东夷人已经能够在东海捕获大鱼。殷墟出土的鲸的甲骨、海贝、海龟壳、象牙、蚌壳产于我国南海、东海或南洋一带,更说明擅长航海的殷人在其入主中原后,依然保持了航海的传统,并有所发展。周代,沿海地区的人们继续发展了航海技术,至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可以乘木船到海上自由航行。所以,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桴于海”¹⁹⁾,如果其主张行不通,就准备入海另觅别处。因此,对殷末周初中原人远距离迁徙和远航能力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同时,也由于汉以后朝鲜县治逐渐内移,与原封地平壤的箕子朝鲜相距日远,因以顾炎武(1613—1682年)《京东考古录》在《辨〈一统志〉朝鲜》条感叹说:“朝鲜在今高丽国境内。慕容氏于营州之境立朝鲜县(今辽宁义县北),魏又于平州之境立朝鲜县(今河北迁安县东北),但取其名,与汉县相去则千有余里。《一统志》乃曰:‘朝鲜城在永平府(治今河北卢龙县)境内,箕子受封之地’。则是箕子封于今之永平矣!当日儒臣,令稍知今古者为之,何至于此?为之太息”²⁰⁾。

箕子朝鲜出现在朝鲜半岛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正值半岛进入青铜器时代。朝鲜学者指出:“进入公元前二千纪后半期,前半期开始萌芽的新的文化因素成长起来,

并呈现全新的面貌”²¹⁾。中国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和内蒙赤峰市夏家店遗址(下层)说明,最迟在公元前15世纪前后,辽东半岛已形成青铜器文化。朝鲜的青铜器文化是在中国的东北地方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并形成自己的独有的特点。朝鲜的琵琶型青铜短剑,在中国称曲刃青铜短剑,它起源辽西,并逐渐通过辽东向朝鲜半岛传播并在形制上发生变异。所以,朝鲜和中国曲刃青铜短剑分属不同文化类型,朝鲜曲刃青铜短剑的节尖部位或脊部有横向凸棱节带,而东北曲刃青铜短剑则没有²²⁾。朝鲜考古学界也是把西北朝鲜与辽河流域的文化作为一个有联系的文化类型进行考察的,辽东半岛双砬子东夷青铜器文化与朝鲜宁边郡细竹里遗址第二期文化层是其典型。支石墓(石棚)是作为古朝鲜政治中心的平壤地区的代表性文化遗存。在众多支石墓中,以平安南道甑山郡龙德里外塞山发掘的第10号支石墓最有名。这个位于平壤西北44公里的支石墓的基石因刻有类似文字的曲线和点而叫“传字石”,墓盖表面有80多个洞,其中心呈北极星状,其余80几个洞以11个星座分布在四周,以表现公元前2800(±220)年的天空;在同一墓址还发现有陶片,其年代为公元前4926(±741)年²³⁾。

《三国遗事》把“古朝鲜”和“魏(卫)满朝鲜”区别开来,说后者“都王险”,并加注:“李²⁴⁾曰:地名。臣瓚曰:王险城在乐浪郡浞水之东”。这是说,由于“王险朝鲜”历来以平壤为都,久而久之,王险也就成了平壤的代名词。《史记·朝鲜列传》说,燕人卫满东渡浞水发展势力,逐渐控制了真番、(箕子)朝鲜,聚“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三国志·东夷传》说:箕子朝鲜末代王准“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并在其下引《魏略》,称:卫满亡命,“诣准降,说准求居西界,(故)(收)中国亡命为朝鲜藩屏”。后来,满以诈言汉军至,求宿卫,“遂还攻准”,准败走,卫满取而代之。很明显,卫氏朝鲜的中心就在王险城,即平壤。这些已经为卫氏朝鲜灭亡后在其故都附近所设乐浪郡的遗址考古发掘所证实。

(二)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满朝鲜后,于其地设置乐浪、临屯、真番三郡。翌年,又置玄菟郡²⁵⁾,史称汉四郡。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撤销临屯和真番二郡,将其辖境并入乐浪和玄菟二郡。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玄菟郡治所从朝鲜半岛迁至今辽宁新宾县以西。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东汉放弃了乐浪郡在单单大岭(今朝鲜北大峰山脉)以东的七个县,“悉封其渠帅为县侯”。东汉献帝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今黄州)以南七县置带方郡。于是,乐浪、带方史称二郡。这样,乐浪郡自开郡到东晋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消亡²⁶⁾,它在朝鲜半岛共存续了422年。

乐浪郡治朝鲜县,其具体位置在浞水(大同江)南,今平壤市乐浪区土城里,俗称“乐浪丘”。在汉四郡中,乐浪郡最大,共25县(初为11县,后并入原属真番郡的南部都尉所7县和原属临屯郡的东部都尉所7县),其地域北至清川江,南达礼成江。在大同江流域下游,发现了许多土城、古墓群和碑碣,出土了大量的乐浪文物²⁷⁾。1918—1937年间,日本学者与日本朝鲜总督府“朝鲜古迹研究会”对乐浪文化遗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发掘,在今平壤市大同江南岸的乐浪区土城里发现了古乐浪郡郡治遗址,残

留的城墙呈不规则矩形，东西约 700 米，南北约 600 米。城内发现建筑基石、甬道、水井、下水道，出土了砖、瓦当、陶器、铜器和大量的封泥。在平壤土城的东南西三面的丘陵和平原的大同江面的 14 个里都分布有古汉墓群，共约 2000 余座。已经正式发掘的约 50 座中，有名的有王盱墓、中岩里 1 号墓、贞柏洞 1 号墓、贞柏洞 221 号墓、梧野里 25 号墓、王光墓、南井里 119 号墓、南井里第 116 号墓、高常贤墓、贞柏洞第 37 号。封土式汉古墓因内部结构不同而分为两类：木椁方台与砖室方台。前期（公元前 1 世纪—1 世纪）多为竖穴式木椁墓，后期（公元 2—4 世纪）主要为砖室墓。砖室墓中有画像砖，多为仙神动物画，有的还有人名和年号，风格与汉画砖一脉相传。在平壤乐浪区贞柏洞第 37 号木椁墓的漆椁上书有“地节四年”（公元前 66 年）的文字，这证明乐浪郡在建立 43 年后其方位乃没有大的变动。

古墓出土大量随葬品，其种类繁多，有金属器（武器、利器、马具、服饰、铜制器皿）、陶器、漆器、货币、玉石器、木器、布帛、瓦器等等。许多漆器、铜器带有彩绘和铭文，其中有铭文的漆器达 57 件，上刻有年号、产地、人名，其制作年代始于西汉始元二年（公元前 85 年），迄于东汉永元十四年（公元 102 年）。1925 年，东京帝国大学的黑枚、圆田二博士和田泽教授发掘了王盱墓，发现了一件绘有西王母与虎龙彩画漆盂和画有八卦与天干地支以表示天地宇宙的漆木式。王盱墓还有铁器出土，上有铭文永平 12 年，这是东汉明帝的年代，为公元 69 年。1932 年 10 月，“朝鲜古迹研究会”在平壤市乐浪区大同郡龙岩面南井里发掘了第 116 号木椁墓，在其前室发现了个精美的彩筐。这是个竹编矮短箱筐，它的四面绘有忠孝义烈人物画，每幅画像旁还有题字，彩画笔致的精巧程度堪与中国长沙马王堆墓的漆器媲美。因此，该墓更名为彩筐冢²⁹。

乐浪郡文化遗址除乐浪郡治址土城里遗址外，还发现了黏蝉县治址（平安南道龙冈郡于乙里洞土城）、带方郡县治址（黄海道凤山郡文井面唐土城）、昭明县治址（黄海道信川郡北部面土城里土城）、夫租县治址（咸镜南道永兴郡永兴所罗里土城）等四座土城。确认乐浪郡治址的根据是在当地发现了有“乐浪礼官”、“大晋元康”字样的瓦当和有“乐浪太守章”字样的封泥；带方郡、县治址的确认，是因为在其附近发现了“带方太守张抚夷墓”³⁰）。

上述的发现本不是日本人的本意，日本朝鲜总督府支持和组织这些调查的目的是服务于巩固其对朝鲜的占领，但在大量带有乐浪郡标志的文物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³¹）。后来，由于一些著名学者的加入和推进，乐浪郡文化的调查才得以取得重大进展。由于这个背景，学术界因有人怀疑乐浪郡文化遗址的真伪而一直存在争论。首先，封泥是存疑较大的一个方面。平壤地区共收集到 200 多块（至 1936 年止共发现 188 块），在土城里发现了乐浪郡 25 县中除吞列、华丽二县外的 23 个县的令、长、丞、尉、宰等官印的封泥，这也是乐浪郡确在平壤的证据。韩国学者郑寅普认为，“乐浪大尹章”是伪造品，因为“大尹”是王莽时代的官职³²），而那时乐浪已经改名“乐鲜”。有人以瓦当中有西晋惠帝年号“大晋元康”（公元 191—199 年）的文字和日本发掘者认为历史最古的 1 号墓有货泉出土，而断定所有汉古墓都是东汉以后的，并进而否定西汉的乐浪郡平壤地区，为其古朝鲜中心在辽东制造根据。但是，从乐浪郡遗址出土品上的铭文看，汉武帝在元封三年于平壤乐浪郡设制以后，西汉的宣、元、成、哀、平、孺子

要等六代帝王的年号，除平帝外都有发现。1958年，朝鲜的考古工作者在平壤贞柏洞发掘了有“夫租？君”、“夫租长”之银印出土封土墓，有人以“君”、“长”之称谓与西汉官职不符，断定这属汉四郡以前的，与汉四郡无关。据《汉书·地理志》，“夫租”是汉四郡的县名，初属玄菟郡，后归乐浪郡，原属沃沮。《后汉书·东沃沮传》说：“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夫租？君”、“夫租长”银印，说明夫租县官员多系土著出身，在被任命为汉郡县官吏后他们乃习惯于使用传统的称谓。

在龙冈郡于乙里洞土城发现了一块名为“汉平山君神祠碑”，碑文系隶书体，全文78个字，其中62个字可辨认，内有“（福）佑黏蟬。兴甘风雨，惠润土田”，祝愿“五谷丰成，盗贼不起”，“出入吉利，咸受神光”。从碑文内容和出土地看，龙冈郡于乙里洞土城应为黏蟬县治所。该碑文因首行多一字，曾有人提出疑问。但是，从碑文古雅字体判断，它确系汉代文物无疑。而且，县治遗址乙里洞古城的文献记载³²和数座古坟的同时存在，更是有力的旁证。乐浪郡文物确有赝品，它们主要存在于封泥和印信中。对此，日本学者早已发现，他们在“报告”中指出：“这种出土品主要是地方人士收集的，其中也出现了赝品，一般对其真伪持怀疑态度”³³。但是，平壤汉乐浪郡文化遗址的文物是大量的，不能，更不应该因个别文物存在疑问和问题而否定整个平壤地区的汉乐浪文化的存在。例如，堪称乐浪文化精髓的石岩里9号墓是座砖墓（横穴石室棺槨墓的前身），墓内有随葬品二百余件，大部分是华丽的镀金物品，其中有一条以七条龙的纯金带钩，这是典型的汉文化的标志。

乐浪郡文化是高度发达的汉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不少区别于中原文化的地方，比如，铜鍍铸范、小铜铎铸范、多钮细纹镜铸范、半两钱等，这些都反映了乐浪郡的文化特征。乐浪郡在被高句丽灭亡后，乐浪遗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保持了自己文化的传统。例如，从铭文砖中知道平壤地区的居民继续使用“建兴”、“太宁”、“咸和”、“建元”、“永和”、“元兴”等东晋的年号。不仅如此，近来朝鲜与韩国还在灭恶山脉北麓的黄海道地区和京畿道地区发现了所谓“土著乐浪系”典型古坟——封土墓。最近，韩国翰林大学博物馆调查组首次在京畿道加平邑达全（音译）里地区发掘出土了青铜器时代的41个村落地遗址和平壤乐浪朝鲜系统的封土墓3处，墓呈南北方向长方四角型，穴内有木槨；墓内出土了陶器和铁器，其中2号墓有典型的乐浪系统的陶器“花盆型陶器”、“鼓肚陶器”，韩国国立博物馆吴映瓚（音译）鉴定说：“出土的文物和古坟的形态与1916年〔日本〕朝鲜总督府关野贞发现的平南龙岗郡葛星里甲坟非常相似”，“这类封土坟和遗物在公元前2世纪才出现”。他认为这是公元前1世纪中叶古朝鲜后期南移的乐浪移民的遗址³⁴。

（三）

平壤乃古朝鲜政治中心的反对者，从来没有联系历史文献对乐浪郡遗址及其出土的文物做过认真的、全面的、系统的解释；在阐述其论据时，他们一般不直接引用《史记·朝鲜列传》或《汉书·朝鲜传》的“朝鲜王满……都王险”的记述，通常回避《三国

遗事》所引《古记》檀君王俭“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和“封箕子于朝鲜”等与论证古朝鲜中心方位有直接关系的重要史料，而偏爱或拘泥于借用古注释家对《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溟水、满番汗、碣石山等古地名的注释进行解释、定位。

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辽东中心说”，视溟水为今辽西的大凌河，置王俭城在被视为列水的辽河附近，根据是那里出土了朝鲜的琵琶型青铜短剑。但是，“辽东中心说”无法解释汉四郡的历史存在。于是，60年代以来，平壤学者依据琵琶型青铜短剑、义州郡美松里型陶器等考古遗物的分布，得出古朝鲜的最初中心在辽东、后来于公元前4—3世纪“移动”到大同江地区的结论。“移动说”是“辽东中心说”的变种，其根据是分布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北地区的青铜器文化时间上差异和继承关系，认为最初发展了辽东琵琶型青铜短剑文化的是古朝鲜，后来受到燕国的压力而退居平壤地区，发展了细型铜剑。但是，这种观点得不到任何文献上的支持，而且如前所指，这在考古学也得不到论证。另外，该说的一个致命问题是，不懂得区分国家、民族和文化圈之间的不同。国家，有如朝鲜—韩国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更多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共同体，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而现代民族则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文化圈则是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广大地域。人类历史无论哪一个国家，因受生产力低下的限制，最初都不可能是如罗马那样的大帝国，而只能是像雅典那样的城邦国家或城邑国家，古朝鲜也不能例外。现代“辽东中心说”所谓的古朝鲜文化标志至多只能是文化圈标志，绝非政治势力圈。任何企图把古朝鲜描述为以辽东和大同江为中心、领土囊括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沿海地区在内的大帝国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

现代“辽东中心说”往往将持古朝鲜的中心在大同江的观点定性为殖民史观，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御用学者的观点，指责它把朝鲜—韩国古代历史的舞台局限在朝鲜半岛。应该说，认为平壤地区是上古朝鲜的政治中心的日本史学家，多数是从尊重古代史籍的记述出发，其立场基本上是客观的。实际上，“大同江中心说”是朝鲜自高丽时期以来的一种传统看法。《三国遗事》和《三国史记》以及李氏朝鲜时期的史学家几乎全部都持这种观点³⁵⁾，只不过到了近代更加系统化罢了。人们不应该因日本殖民地学者也持大同江中心说而否定它的正确性。

檀君作为民族始祖和国家的崇拜对象是朝鲜王朝的事情。以这种历史观为基础的《东国通鉴》（1485年编）、《东国輿地胜览》（1481年编）等史地文献把古朝鲜的中心定在鸭绿江以南；16世纪以后的史书也继承这种观点。壬辰抗倭战争和丙子事变后，中国东北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化，促使朝鲜朝野开始关心国际事务；而孝宗（凤林大君）反清“北伐论”又导致小中华思想的抬头。于是，上古史的研究遂成热门话题。韩百谦（1550—1613年）的《东国地理志》，虽已把夫余、高句丽和渤海作为建立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国家个别加以处理，但古朝鲜的中心依然被置于鸭绿江以南，古朝鲜与三韩分界线以汉江为界。他还特作《箕田考》，说：“丁未秋，余到平壤，始见箕田遗制，阡陌皆存，整然不乱……其制皆为田字形。田有四区，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计之有四田八区，竖计之亦有四田八区。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此盖殷制也”³⁶⁾。17世纪中叶，

随着正统论的出现,三韩的比重增加。安鼎福(1712—1791年)的《东史纲目》是其代表著。丁若镛、韩志雍继承之。丁若镛认为古朝鲜的中心在朝鲜半岛内,后扩张到辽西与燕接壤。沔水是鸭绿江,乐浪在平壤,玄菟在咸镜道,临屯在临津江,带方郡在临津江下游。韩志雍和韩镇书的《海东绎史》虽认为古朝鲜的疆域扩展到辽西,但首都在平壤。但是,激进的南人洪如河(1621—1678年)的《东国通鉴提纲》认为辽阳旧称平壤,是真番的所在地、卫满的邑都,沔水不在朝鲜半岛而是辽河,满番汗也在辽阳城方向。但是,他承认乐浪的位置在平壤。英祖时代的申景浚(1712—1781年)在《疆界考》中把古朝鲜的西部疆域,延长到古之孤竹国(现大凌河和滦河之间)和上谷之东(北京以北)。李瀛(1681—1763年)则把檀君朝鲜的中心置于辽河流域,推测真番在辽河以西。18世纪末以后,针对中国辽金史家的自我中心史观,更多的南人实学家则把注意力用以考证古朝鲜的中心舞台在朝鲜半岛。《辽史》作者为突出中国北方族在东北亚历史上的中心地位,故意把一些古地名从朝鲜半岛搬到辽东,南人认为这是在矮化古朝鲜,使其周边化。在一定意义上,1778年《满洲源流考》的问世也是出于同一目的。受此影响,李氏朝鲜后期的学者论证古代朝鲜的中心位置在朝鲜半岛的着眼点,恰恰不是贬低其历史的地位,而是对清朝以我为主的史观的反击,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历史自觉。此后又加上乐浪郡的考古发掘,大同江中心说增加了考古学的证据,成为几乎不可动摇的定论。后来,李丙焄以实学时代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一步系统了这种观点。他视阿斯达为现今的平壤,《史记》上的沔水是清川江,《魏略》上的满番汗在博川江一带,《汉书》上的列水乃大同江,古朝鲜的疆域在今平安南道地区。不过,李氏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卫满朝鲜以后,这就给怀疑论留下空间。

20世纪20年代,处于日本占领状态下的民族主义史学家申采浩、崔南善、安在鸿、郑寅普等从保存、张扬民族文化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否定朝鲜历史的行为的需要出发,先后接受了南人的历史观,开始把朝鲜古代的历史搬到中国内地,企图借以说明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与中国一样悠久、灿烂,而汉四郡的位置在朝鲜半岛以外。申采浩把古朝鲜分作“始初”檀君朝鲜和真、番、莫三朝鲜,说它们活动的主要舞台在辽东和中国东三省,东夷族在中国境内的运动是夫余族的殖民活动,并以语言学考证法和地名移动论,认为王俭城旧址在辽宁海城,沔水在近海轩芋站,乐浪郡与乐浪不同,其位置在辽东。郑寅普进一步把申采浩的古朝鲜论具体为所谓‘发朝鲜’、‘真番朝鲜’、‘秽貊朝鲜’、‘了浪朝鲜’,其疆域在朝鲜半岛以外的开原以北、兴京以南的地区,汉四郡也全在辽东,乐浪遗址是日人伪造,不足以证明在其所在。近代某些学者在古朝鲜问题上的激进主张具有挑战传统和“权威”的意义,有其出现的正当理由,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例如,申采浩因受《乙巳保护条约》的刺激关心历史问题,开始阅读《东国通鉴》,研究满韩关系,并得出韩国的命运取决于与“满洲”的密切关系³⁷。但是,作为学术问题,或封建社会末期文人挑战传统的一种思潮,他们的观点大多没有直接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学的支持。朴趾源是近代“辽东说”的实学派代表人物,他在《辽河日记·渡江录》中提出的关于的数个平壤的主张和对沔水、汉四郡的主体在朝鲜半岛的否定,是他作为赴清使团随员过凤凰城有感,并非是严肃的学术论著,其所引用的史料大多有误。例如,他称《唐书》云:安市城距平壤五百里,凤凰城称王俭城。但是,查遍新旧《唐

书》，均不见此等文字；又如，他引用的《隋书·裴矩传》，错把“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写成“高句丽，本孤竹国也”，把“汉世分为三郡”误说成“分为四郡”，并增加原文没有的“孤竹地在永平府”的文字³⁸。他说他之所以早已对汉四郡的位置发生怀疑，是因为《汉书·地理志》只记有玄菟、乐浪，而不见真番和临屯。但同时又说，汉昭帝元始五年合四郡为二府，元凤元年改二府为二郡，自相矛盾。

当代“辽东中心说”的突出代表是朝鲜的李趾麟和韩国的尹乃铉。从1962年起，经李趾麟等少壮派学者的发起，朝鲜史学以讨论古朝领域为起点全面修改传统观点；第二年，朝鲜科学院出版社版《古朝鲜研究论文集》问世。于是，主张以平壤为中心的大同江流域说（以都有浩为代表）被否定，政治中心流动说抬头。“流动说”认为：古朝鲜的首都经过滦河的‘孤竹国’（卢龙）、大凌河下游的义县（旧昌黎）、北镇的险淊和辽河流域的沈阳到达平壤。这虽可以回避战国末年朝鲜半岛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如与三韩、带方郡的关系等，但也给人以上古时期整个朝鲜半岛处于史前蛮荒的印象。20世纪60年代末，汉城开始有人附和李趾麟等人的观点，这主要是所谓“野史”者，其中包括一些基督教和大宗教的神学家；20世纪70年代末，韩国有一批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甚至企图以“运动”和司法的方式，推销其错误观点。1978年秋，以韩国恢复国史协议会会长安浩相、东方思想研究院院长金得槐与韩国正史学会会长林承国等人为首的一批文人，通过向本国教育部递送“建议书”或向汉城高等法院呈递“行政诉讼状”等方式，指责、控告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编写的《国定国史教科书》“否定始祖檀君，删除其2140年的历史，抹去古朝鲜领土的十分之九”，认为：太皞伏羲是韩民族“倍达东夷（檀·东夷·朝鲜）的种族”的“始祖”，“檀君朝鲜，即古朝鲜，最初立国的地方在太白山、松花江和鸭绿江流域”，绝不是大同江畔的平壤，而百济“国都在辽西”，曾统治中国长江流域达四百年之久，统一新罗“国土东达吉林，西至北京”。他们的行为在韩国学术界引起恐怖气氛，制造了所谓“国史教科书波动”。与此同时，一系列诸如《揆圆史話》、《桓檀古記》等仿古伪作大量问世。一时间，这些伪书和根据这些伪书出版的读物，如崔永泰的《韩国上古史》（汉城，遗风出版社，1990年版）、韩舜根著《以古记看韩国古代史》（汉城，新岩出版社，1997年7月版）竟成为销量最大的图书，甚至出现了此类书籍的专销店。经韩国学者考证，这些所谓的古记大体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现代人假托古人伪造的，所反映的内容基本上是申采浩、崔南善等近代朝鲜民族主义者文人的历史观及其对“韩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³⁹。

李趾麟等人的“辽东中心说”与《史记》记载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以辽水为滦河，以泃水为大凌河，并以此为燕与古朝鲜的界河，以列水为今辽河，把该书《朝鲜列传》关于卫满亡命的路线描述为辽水→辽东故塞→泃水→秦故空地→王俭城。于是，王俭城被定位在今盖平附近，古朝鲜的疆域在秦开进攻前到达滦河流域，此后退至大凌河流域。李趾麟的论断与古地名的任意比附有许多明显的漏洞，例如，他说辽东在滦河以东，这样“属秦辽东外徼”的旧燕地，反比燕的障塞还向西。《史记》说卫满渡泃水，居燕障塞以东之秦故空地，如果按李说必然得出秦代的领土要比燕时还后退。后来，朝鲜史学界根据考古学的新成果，放弃了李趾麟公式化的研究模式，逐渐把古朝鲜的中心移向清川江、大同江。但是，当20世纪80年代朝鲜重新回到

“平壤中心说”、强调檀君朝鲜是以平壤为政治中心的“东亚帝国”时,“辽东中心说”在汉城竟成了以尹乃铉为首的一批极端的民族主义学者的时髦。但是,进入21世纪,奇怪的是他们又去支持新的“大同江中心说”。2002年10月1—3日,由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学会、韩国檀君学会会长尹乃铉为首的宗教界和文化界人士参加的“南北历史学者关于檀君与古朝鲜学术讨论会”在平壤举行,会后发表的报告称:公元前30世纪,由檀君创造的大同江文化是世界古代文明之一;《揆圉史話》等“秘史”“反映了历史的事实”,“有一定的根据”;“檀君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民族的第一个国家——檀君朝鲜的建国始祖”;“古朝鲜以今天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广大地域为基本领域的强大国家”⁴⁰。

(四)

如果在坐落方位有争议邻近地区找一个史书记载清楚地点作为坐标,将会对解决古朝鲜具体方位做出有益的贡献。战国时期的燕,古与朝鲜为邻,其地域方位史书记述详尽、明确。《史记·苏秦列传》称:“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噤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苏秦在这里讲的是燕国的四至,每一面都由远及地列举了二个地名,指出燕国之东有朝鲜和辽东。古辽东的地理范围是:西起燕山、滦河以北,东至鸭绿江以远。因此,战国初期的朝鲜的西部疆界在清川江附近。可是,国外有人在判读“朝鲜、辽东”一句时,竟不顾全文语法结构而取消其间的顿号,把它解释为“朝鲜的辽东”,并说“战国时期的中国承认了朝鲜的辽东”⁴¹。但是,《汉书·地理志下》说:“燕地……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及渤海之安次”,清楚说明辽东是“燕地”。在语法上,《史记》中的“朝鲜、辽东”是并列词组而不是主从关系,它们是两个独立的概念⁴²。“辽东”是名词,《辽东志》解释说:“辽,远也。以其远在九州之东,故名辽东”。这是中原人依据“九州说”而为其东方辽远之地命名的。作为地区名,古辽东与泛指辽河以东地区的今辽东不同,它还包括了后来的辽西和辽东。战国时期的辽东是东胡人经常出没的地方。《汉书·地理志》燕地条说:“上谷至辽东,地广民稀,数被胡寇”。古辽东在秦开拓疆之前,这片广阔区域的居民主要是处于史前时期土著胡貊人。在今大同江中下游的古朝鲜(良夷、乐浪之夷或乐浪朝鲜)与胡貊、蛮夷部落⁴³的界线在清川江一带。据此,似可断定古朝鲜的方位在“燕地……辽东”(今辽东半岛)之外。无论箕氏朝鲜还是卫氏朝鲜,其地皆不在辽东。

古代的东亚,“国”实际是较大的邑。通常,较大的“国”都控制着多个邑,以最大的邑为国都,即所谓王畿。远离王畿的四方,分布着王朝所分封或承认的许多诸侯方国,“它们杂厕于另外许多与王朝并立,或者敌对的其它方国之中。并且在这些国与国之间,还会夹杂着一些无主的荒地草原。”⁴⁴《史记·货殖列传》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北邻乌桓、夫余,东结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这是说燕不仅是渤海沿岸的一个政治中心,也是南通华东、华北,东向控扼朝鲜半岛商贸之利的会集环渤海地区人流物流的大邑。但作为一个列国中“领域国家”,从西边的上谷(治所在今怀来)至辽东边陲以至另一个“领

域国家”朝鲜，中间会夹杂着一些无主的荒地草原。这也就是先秦史家没能够把当时朝鲜的领域讲具体的原因。

燕将秦开对东胡和朝鲜进行征伐以后，燕在胡貊人居地建立辽东郡⁴⁵⁾，“以拒胡”⁴⁶⁾。于是，辽东地区一分为二，辽西、辽东二郡的分界线是医巫闾山，那里是东胡与貊人的分界线。燕朝战争后，燕“至满番汗为界”⁴⁷⁾。学术界对满番汗解释争论颇多。满番汗应即《汉书·地理志》辽东郡的“番汗”县。据有学者研究，“满番汗”的“满”字“当指汉初曾王于‘朝鲜’的燕人‘卫满’”⁴⁸⁾，即“卫满的番汗”地方，书为“满番汗”。(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引用(清)陈澧说，定“朝鲜国博川城大定江(大宁江)”为沛水，认定该水入海处，即为番汗县。后经今人考证，西汉时期的番汗县在“今朝鲜平安北道博川城南十里古博陵城”⁴⁹⁾。不过，韩国学者另有说法，他们以《汉书·地理志下》有辽东郡“县十八：文，莽曰(受)[文]亭。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为据，认为这里的辽东“文”是《后汉书·地理志》的“汶”县，它与“番汗”相连，“‘满番汗’等于‘汶·番汗’”，“汶”是盖平，“番汗”是博川，燕国边界在盖平—博川一线，以南归朝鲜，以北属燕⁵⁰⁾。这一观点虽富有想象，但没有史料根据，不能成立。

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属辽东外徼”。当时，秦虽维持了满番汗边界线，但又在其以南的乐浪云耆一带建立了“上下郡”。西汉时，因认为鸭绿江南地“其远难守”，故“复修辽东故塞，至泅水为界，属燕”⁵¹⁾。《魏略》也说“及汉以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界于泅水”。首先，应该指出：上文所谓“故塞”，是指燕秦长城而言⁵²⁾；所以，这里的“塞”、“故塞”、“外徼”与“秦故空地上下郡”，绝非“古朝鲜故地”，乃先秦中原王朝在旧燕地之东方荒野设置的长城和要塞。汉武帝时代在辽东及其边远地区和汉四郡所修郡塞，可称为“汉武边塞”⁵³⁾。其次，《史记》与《魏略》分别确认泅水是汉长城复修所至终点和汉卢绾(公元前247年—公元前193年)燕与朝鲜的边界，而西汉时期的泅水是今朝鲜大同江⁵⁴⁾。《汉书·地理志》说：乐浪郡有“县二十五：朝鲜、讲郎、泅水，水西至增地入海”。在这里，泅水既是县名，也是水名，水西流入海，符合上列条件。以此看来，泅水确是今大同江。泅水在历史上曾多次变动，战国燕时的“泅水”是今清川江。《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安州牧山川条称：“清川江，一名萨水……经州北城下西流三十里，与博川江合入海”。当清川江更名萨水时，泅水之名遂东移于大同江⁵⁵⁾，而大同江古名“列水”遂在文献上消失。

长城的终点问题有助于古朝鲜的西境问题的解决。燕秦长城，即所谓“故塞”，是随着燕向外扩展领土而不断向东延伸的。燕大规模筑长城是在昭王时代(公元前311—公元前279年)。考古发现在北纬42—43度之间内蒙古昭盟境内有多道古长城遗址，它们被称为“赤北长城、赤南长城、老虎山长城”⁵⁶⁾。秦开曾两次用兵，出于军事上的需要，燕在相关地段把“赤南长城”向北推移百余里，因而修筑了“赤北长城”。辽南的长城亦有南北之分，南长城又称“易水长城”，北长城，即《史记》所谓“自造阳至襄平”的长城。1984年，朝鲜考古界在平安北道大宁江地区发现了绵延300朝里(约120公里)的“古长城”。“长城沿博川郡的中南里、元南里，宁边郡的馆下里、古城里，泰川郡的龙兴里、鹤堂里、德化里、丰林里、阳地里(旧龙田里)，东仓郡鹤峰里、鹤松

里、凤龙里、鹤城里、新安里（旧和丰里城兴洞）的大宁江及其支流昌城江，以及昌城江的支流域兴川的东岸，在约 300 里的区间内蜿蜒”⁵⁷⁾。其起点所在位置，在博川江（今大宁江）入口处，亦即清川江入海处之北。这里正是汉代辽东郡番汗县所在地。据此，中国学者断定“这道长城是燕国北长城的东端起点段”，认为燕长城的走向是“从清川江与大宁江入海口之北岸起，即今朝鲜平安道中南里起，沿大宁江、昌城江、城兴江尔后达鸭绿江；过江即进入我国宽甸……最后经赤峰北面达于滦河源的长城起点地”⁵⁸⁾。

《史记·匈奴列传》和《蒙恬列传》说，秦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在东北地区，秦长城利用了燕长城的“赤北长城”，但其东端起点较燕长城更远。郦道元《水经注》说：“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晋书·唐彬传》称：他曾“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自温城泊于碣石”。在东北亚地区碣石古名有三处：一在河北昌黎⁵⁹⁾，二是辽宁省南部⁶⁰⁾，三是汉乐浪郡遂城之碣石。国外有人以秦始皇刻石观海的碣石在我国昌黎，认定“古朝鲜的西部国境由今天的滦河和碣石山形成”⁶¹⁾。其实，这个碣石是“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的碣石，即西汉乐浪郡遂城县碣石山。故“太康地理志云：乐浪遂城县有碣石山，长城所起”⁶²⁾。早期史书《地理志》均明记乐浪郡有此县，而《晋书·地理志》还在“遂城”下加注：“秦筑长城之所起”。（唐）杜祐著《通典》卷一八六高句丽传也说：“碣石山，在乐浪郡遂成县，长城起于此山。长城东截辽水，而入高丽，遗址犹存”。吴熙载的《通鉴地理今释》更明确指出：“秦筑长城，起所自碣石，在今高丽界”。这些记载和近年来考古调查与发掘所揭示的秦长城旧址，在赤峰、敖汉、奈曼、库伦一带往东延伸完全相符；其具体走向是西迄独石口，经围场、赤峰北至敖汉旗的南半部进入奈曼旗的牯牛河上游，东去库伦旗南部，再继续往东蜿蜒达阜新县北部，过彰武、法库东抵开原；开原以东以障塞形式进入朝鲜半岛，最后抵达平安南道之龙岗。文献记载的秦长城“至辽东”是泛指，而“泊于碣石”是专指，必须弄明白。秦长城东端止于辽东郡的东部，即乐浪郡遂城县之碣石，也就是现在朝鲜半岛的龙岗（碣石）。在平安南道发现过燕国刀币和铁器工具以及秦戈等遗物也佐证了这一事实。

总体上说，古朝鲜的西部疆域大体维持在清川江一带。当然，在其强盛时，也曾一度“踰徼，劫燕之东地”⁶³⁾。但是，这类情况并不多。例如，即使在箕子朝鲜侯“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时，也终未采取行动；“后子孙稍骄虐”，虽也觊觎燕辽东的土地，却又逢燕国进一步强大起来，遭到秦开的军事打击，并一蹶不振。卫氏朝鲜基本上是作为辽东太守“保塞外蛮夷”的“外臣”，与其西方的燕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元封二年，因汉使涉何“杀朝鲜将”，发生了“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⁶⁴⁾。然而，正是这个事件成了汉武帝灭古朝鲜的导火线。大约在古朝鲜存在的同时，朝鲜半岛中南部存在有真番、辰国等势力，而在汉于朝鲜设郡县后，在原三韩地区新兴的百济和新罗相继发展起来。因此，阐明它们与古朝鲜和乐浪郡的关系，将有助于了解古朝鲜南界和东界的状况。

《汉书·朝鲜传》说“真番、辰国欲上书见天子，又雍闾弗通”；又说“真番旁众国”。这说明至少在卫氏朝鲜时期，真番与古朝鲜为临。真番其名早已为中原所知，战国时期的燕国曾与之贸易⁶⁵⁾。但是，中国史家对它的历史沿革并不清楚，有关其地望的